

流动儿童与 城市社会融合

王毅杰 高燕 | 等著

Social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Migrant Peasants' Children
and Urban Citizens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流动儿童 与 城市社会融合

王毅杰 高燕 | 等著

Social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Migrant Peasants' Children
and Urban Citizens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流动儿童与城市社会融合/王毅杰等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 - 7 - 5097 - 1419 - 5

I. ①流… II. ①王… III. ①流动人口 - 儿童 - 城市 - 社会学 - 研究 - 中国 IV. ①D669.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76382 号

流动儿童与城市社会融合

著 者 / 王毅杰 高 燕 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社会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156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项目经理 / 童根兴

责任编辑 / 郑 嫵

责任校对 / 丁新丽

责任印制 / 郭 妍 岳 阳 吴 波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印 张 / 18.4 字数 / 337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1419 - 5

定 价 / 3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1
第二节 文献回顾	4
第二章 研究思路与方法	18
第一节 研究思路	18
第二节 研究方法	31
第三章 城市社会的接纳	36
第一节 城市社会的特质	37
第二节 城市政策的调整	41
第三节 大众传媒中的流动儿童形象	48
第四节 市民对流动儿童的社会距离	56
第四章 家庭环境	65
第一节 研究回顾	65
第二节 家庭基本情况	74
第三节 不利于社会融合的家庭条件	84
第四节 小结	108

第五章 学校环境	112
第一节 学校类型	113
第二节 办学条件与校园活动	119
第三节 师资与教学	125
第四节 学生	137
第五节 小结与思考	146
 第六章 “差生”的形成	151
第一节 研究架构	151
第二节 差生的学校生活	157
第三节 差生的家庭生活	175
第四节 差生的“另类生存”	193
第五节 小结与讨论	196
 第七章 城市社会交往	200
第一节 社会交往概况	200
第二节 社会交往逻辑	202
第三节 信任结构及其形成机制	217
第四节 心理状况及影响因素	230
 第八章 社会认同	243
第一节 相关研究	243
第二节 社会认同的图景	260
第三节 生活情境中的认同建构逻辑	271
第四节 社会认同的策略性选择	285
第五节 小结	296

第九章 结论与展望	300
第一节 社会融合状况	301
第二节 生活情境	304
第三节 研究展望	310
参考文献	316
附录 1 儿童生活问卷	341
附录 2 家长生活问卷	351
附录 3 市民调查问卷	355
后 记	359

第一章

导 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流动农民不再以“单身外出”而是以“举家迁徙”方式进入城市务工经商，家庭化趋势、移民定居趋势逐步扩大，流动人口中儿童所占比例也逐年增加。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当时全国流动人口总量为 1.0229 亿，流动儿童数量达到了 1409 万，占流动人口总量的 13.78%，其中农业户口的占 70.9%（段成荣、梁宏，2004）。据 200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全国流动人口总量增至 1.4735 亿，流动儿童规模则跃至 1834 万，占全部流动人口的 12.45%，与 2000 年相较略有下滑；其中农业户口的占 76.5%，略高于五年前的全国人口普查水平（段成荣、杨舸，2008）。

这些调查数据还显示：①流动儿童多属“随迁家属”或“投亲靠友”，这两项占总数的 80% 左右（段成荣、梁宏，2004；段成荣、杨舸，2008）；②流动儿童多属长期居住，而非短期滞留。“五普”资料显示，流动儿童中至少有一半在流入地居住满 4 年或超过 4 年，有 75% 的人居住 2 年或 2 年以上（段成荣、梁宏，2004）。从 2005 年的抽样数据也可测算出，在 6~14 周岁流动儿童中，1/3 的儿童流动时间超过了 6 年（段成荣、杨舸，2008）。

规模庞大、在城市居住时间较长的流动儿童已成为新生的流动大军，他们在城市的生活状况也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最早涉及流动儿童问题的文献，是天津市河北区教育局在招收

流动儿童入学方面的经验之谈（华耀龙，1994），主要与义务教育有关。同年，《社会》刊发了一篇题为《漂流的花朵——打工族子女教育备忘录》的文章，该文列举了发生在全国各地的流动儿童辍学的事例，并呼吁“希望工程”应将“希望之光”辐射到这些打工族子女身上（龙腾华，1994）。1995年1月21日，李建平在《中国教育报》上发表了《流动的孩子哪儿上学——流动人口子女教育探讨》，有关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问题开始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此后，国务院及教育部先后推出一系列极具针对性的政策法规，以改善城市中流动儿童义务教育方面的不利状况。据统计，1996～2006年，中央先后共颁布了9部关于解决流动儿童就学问题的政策或措施，并形成了目前的“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全日制公办中小学接受为主”的“两为主”基本政策框架。与此同时，各省市相关部门也出台了相应的配套措施，逐步缓解了流动儿童上学难的问题（杜越、汪利兵、周培植，2004：111）。

同时，学术界特别是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对流动儿童展开了各种研究，出版了众多学术论文与著作，使我们对流动儿童在城市的社会生活状况有了较为全面、清晰、深入的认识与了解。

有关流动人口的研究，关注较多的是处在就业年龄段的流动农民，已经积累了一些有价值的、受到普遍认可的结论（王毅杰、王微，2004）。然而，针对由流动农民带入城市生活，乃至就在城市出生的未成年子女，即流动儿童的有学术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在这些研究中，核心概念界定模糊，内涵与外延差异较大，近似领域的研究不具有继承与发展性；根据地方性统计资料进行的描述性研究较多，基于大范围、系统性资料而进行的深入研究较少，研究成果不具有可比性；或是抽象的理论层面分析，或是单纯的数据罗列，鲜有在明确理论指导下的经验研究。因此，整体而言，该方面有意义的、有价值的研究并不多见。

致力于探寻流动儿童^①城市生活的本书，理应以一定的理论

① 在本研究中，流动儿童指的是，跟随父母或其他亲人流动到城市生活半年以上的农村户籍儿童。在实际资料收集，我们主要分析了就读于公办学校或民工学校的小学和初中的这群儿童，年龄集中在10～16周岁。

为参照并对话，构建较明晰的概念与分析框架，利用系统的经验数据，对流动儿童群体进行客观、科学的分析。当然，对这一群体进行基础研究，不可能面面俱到，需要对其中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有所取舍。在此，我们更为关注流动儿童与城市社会的互动关系，即流动儿童与城市社会的融合问题。

2005年10月27日在法国发生了大规模的骚乱，这被认为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经受的破坏最严重、波及面最大的社会动荡。这次骚乱的根本原因，恰恰就在于这些出生于法国、成长于法国的年轻“外国人”认为自己没有被当成法国人，没有得到作为法国人理应得到的教育、就业等各种机会，甚至没有作为法国人的身份（Identity）（段成荣，2008）。以这场骚乱事件为鉴，我们必须认真考虑我国流动儿童与城市社会的关系问题。

对于改革开放后最早进入城市社会的流动农民来说，受户籍制度影响形成的“生活预期”或“生活目标”使得他们年轻时在城市赚钱养家，年老时依然回农村生活。而随后进入城市社会的流动农民接受了更多的学校教育，没有或只有较少务农经历或农村生活经验，其动机已不是简单的“谋生存”，而有更多的“求发展”的考虑，同时在生存策略上也形成准备定居与不准备定居的分化。这种生存策略不仅与其融入城市主体生活之间相互影响，而且在不同的生存策略下形成了不同的生活和行为模式，对身份认同出现模糊化和不确定现象，对家乡的依恋在减少（李强，2003；王春光，2001）。

对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流动儿童在户口登记地以外地区的流动并不像人们假设的那样是暂时的，而是一种长期流动（段成荣、杨舸，2008）。作为成长在城市的“农民”，他们再回老家求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性和可行性都很小（段成荣、杨舸，2007）。也就是说，对于这些从小在城市生活，没有多少农村记忆的流动儿童来说，今后他们更可能在城市定居。

因此，当试图融入城市社会的种种努力受到各种因素的阻碍难以实现时，当教育及将来的就业不能满足他们定居城市的需求时，当社会环境中仍旧充斥着对流动人口的歧视与排斥时，流动儿童更可能在态度与行为上采取某些方式来表达不满，可能形成

类似第一代中较为年轻的新生代“问题民工”的现象（赵树凯，2000；王春光，2001：63～76），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因此，探讨流动儿童与城市社会的融合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那么在城市社会，流动儿童处于一种怎样的生活情境中？在这种生活情境下形成了一种什么样的社会融合（社会交往与社会认同）状况？这正是我们所力图回答的问题。

第二节 文献回顾

对流动儿童的研究，可以粗略概括为四方面：卫生保健、教育、心理、社会问题（尤指社会适应、社会融合等）。由于卫生保健与本课题研究关系不大，在此略而不述。

一 教育问题

对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研究，包括教育制度与政策、民工学校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与学习状况三方面。

（一）教育制度与政策的研究

前已提及，为缓解当时流动儿童入学难的问题，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十年间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措施，这些措施显示出“有关农村流动儿童的概念已逐渐清晰”、“政府对流动儿童重视程度逐年加大”、“政府对流动儿童由管制到服务的理念转化”，以及“中央对地方政府的工作要求逐步具体、清晰”（吕少蓉，2008）等特点，在取得一定社会效果的同时，也体现了国家在控制和解决此问题上的立场和力量。

然而，也有研究者指出，流动儿童教育问题更深层次的制度性因素，如户籍制度、法律体系（冯帮，2007；张慧洁、姜晓，2008）、财政拨款（张慧洁、姜晓，2008）、政策执行监控（刘成斌，2007）等，若没有作出相应的改革和调整，则很难从根本上解决流动儿童在流入地平等享受义务教育权的问题。目前，由于这些因素涉及国家行政管理与政策体系的方方面面，学界虽有诸多讨论，但并没有妥善的对策。

正因有上述因素的多重掣肘，流动儿童在城市社会的入学上依然存在不少障碍，如公办学校的择校费、借读费（李玮，2004：284）和高门槛（如要求独生子女证等五证齐全）现象，相关政策未有效执行，使流动儿童教育的总体隔离局面虽被打破，但仍处于一种局部隔离状态（甘满堂、郑燕娜，2009）。“初中升普通高中难、初中升重点高中更难、高中升大学难上加难”现象（冯帮，2007），流动儿童中辍学现象（吕绍青、张守礼，2001）和童工现象（韩嘉玲，2000；段成荣、梁宏，2004）等比比皆是。

因此，虽然国家现行政策规定流动儿童入学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全日制公办中小学接收为主”，但由于出台时间较晚（2001年），同时在资源配置、财政支持及政策执行等方面存在问题和限制，仍有一些流动儿童就读于民工学校或简易学校。在进入城市公办学校的流动儿童中，有两种情况值得注意，一种是与城市儿童分开，进行单独编班，还有一种是这所公办学校中城市儿童所占比例不大，多半成为教育部门指定的接受流动儿童的公办学校。

（二）民工学校“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的研究

尽管对民工学校存在的种种问题，学术界和管理界有颇多微词，但基本形成的共识是，开办民工学校是应对流动儿童入学难的最经济、最快速的解决措施，对它的认识应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考虑。

据记载，国内第一所民工学校创办于1993年9月1日，是安徽一位名叫凤良山的小学教师，弃教到上海打工后，受老乡不断劝说才决意开办的，当年只有28个学生，教室是垃圾山上的两间棚子（马良、孙宝瑞，2007）。此后，各类民工学校如雨后春笋，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北京行知民工子弟学校。这些民工学校由于规模小、成本低，又被学界称为简易学校，因为收费低廉，且部分学校还针对流动儿童家庭的特点，推出随时入学、分期付款、校车接送等便利措施，受到不少流动儿童家庭的欢迎（崔传义，2004：312；闫丽君，2007；曾恒，2008）。

不过，虽然这些学校满足了低收入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需

要，受到社会道义上的支持，但是其“合理性”向“合法性”的过渡之路却并不平坦。中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徐鲁平指出：“民工子弟学校以及随之而出现的流动人口子女教育市场化，使得这个群体的教育的义务性业已丧失，属于以赢利为目的的市场经营性行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以致学校的教育水平被压到最低水平，不少学校甚至低到影响学生身心健康的地步。”（转引自马良、孙宝瑞，2007）因此，民工学校的合法化过程，总体上不是由学校自下而上争取，而是教育部门迫于一定的压力而进行自上而下的检查与审核，以决定行政取缔还是批准。于是，关于民工学校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便有了争论的余地。

一方面，民工学校为流动儿童接受义务教育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这几乎是众所周知、无法抹杀的；另一方面，这些学校条件简陋、师资力量薄弱、环境混杂，提供的教育质量实在令人担忧，对学生未来的负面影响难以预料，这也算是尽人皆知、有目共睹的。从所有流动儿童都能接受义务教育这点来考虑，部分论者希望对民工学校提供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不论是法律政策上，还是资金设备上（闫丽君，2007；黄卉，2007；曾恒，2008）；从流动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质量甚至未来的发展考虑，其他研究者则希望有关部门尽快降低和取消城市公立学校的准入门槛，给流动儿童提供公平的教育环境（韩嘉玲，2000；曾守锤、李其维，2007）。事实上，这两个派别争论的基点并不在于取缔还是支持现有的民工学校，而在于城市公立学校是否有可能平等地接纳所有流动儿童。如果认为目前城市公立学校在这方面依然存在着难以迅速消除的困难，则不妨支持发展民工学校，这样最起码能够使流动儿童上得了学；而如果认为目前城市公立学校能够做到全员、平等接纳流动儿童的话，则可以考虑取缔民工学校。这个基点没有厘清，则这方面的争论也不会停止。

现在的情况是，部分地区已在执行2001年国务院提出的《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正逐步向流动儿童敞开公立学校的大门，并只收取与当地学生同等的费用。如果将来城市公立学校可以全员、平等接受当地流动儿童，则民工学校自然失去了成长壮大的土壤，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会变成流动儿童能否像

当地儿童一样,有机会进入公立学校中的名校,在入学费用方面是否还可以享受一定的优惠,以及改革目前以户籍为限的考试与升学制度。如果城市公立学校在一段时期内尚不能全员、平等接受当地流动儿童,则多方支持民工学校的生存和发展也是理所应当的。

(三) 家庭教育与学习状况

关于流动儿童学习状况的研究并不多见,究其主要原因,可能是流动儿童学习成绩与城市儿童相比总体偏低现象显而易见(高梅书,2004:55;丁小燕、陈洪岩,2005),而这不是这两类儿童学习上上进心方面的差异(郭良春、姚远、杨变云,2005;植村广美,2006),可供解释的因素也无外乎流动农民家庭文化与经济资本薄弱(赵娟,2005;王涛、李海华,2006)、对家庭教育不够重视影响子女学业(郭良春、姚远、杨变云,2005;江立华、鲁小彬,2006;周海玲,2008),在教养方式上,父母给予流动儿童更多的拒绝、否认(曾守锺,2009),转学频繁影响学习效果(赵娟,2005),以及以前上学的农村或现就读的民工学校教育资源贫乏对学习兴趣的影响等(邹泓、刘艳、李晓巍,2008)。这一领域难以激起后续研究者的热情,至少就目前而言,更为详细、深入的描述与分析尚未发现。

正处于学龄期的流动儿童,能否享受义务教育,不仅关乎他们自身的成长,也牵涉国家与社会的长远发展,因此社会各界多有关注。在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总体而言,问题正趋于缓解。

二 心理问题

流动儿童正处于心理与行为发展的关键时期,很容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大多数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他们来说,现下复杂的社会环境与以往差别很大。在这种条件下生活,他们受到了哪些影响,又如何应对,以及这种应对方式造成了什么后果,是关注流动儿童心理问题的研究者所普遍讨论的。

有关流动儿童心理问题的研究,大多数着眼于展现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或者民工学校与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之间心理特征

上的差别，并就其中显露出的问题进行分析与解释。

关于前者，大多数研究显示，流动儿童的心理问题普遍比城市儿童严重。比如有研究者发现，与城市儿童相比，流动儿童内化问题行为比较突出，存在更多的焦虑、抑郁、孤独等情绪问题（李晓巍、周泓、金灿灿、柯锐，2008）。更有研究者通过比较少管所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的心理测量指标，认为流动儿童在环境适应方面有不良的行为表现，以及可能存在明显的心理功能损害（向娥英、黄任之，2008）。

关于后者，大多研究者发现公立学校或混合学校流动儿童的心理状况普遍好于民工学校，主要表现在自信心与效能感（邹泓、刘艳、李晓巍，2008）、自尊发展水平（李小青、邹泓、王瑞敏、窦东徽，2008）、自我概念、孤独感与抑郁感（曾守锺，2008c；周皓，2008），以及外向性、宜人性、谨慎性、开放性、乐观和掌控感等正性人格特征方面（王瑞敏、邹泓，2008）。究其原因，有学者认为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与所感受到的社会歧视具有密切的联系（蔺秀云、方晓义、刘杨、兰菁，2009）。这正与前述主张进一步向流动儿童开放城市公立学校进入门槛的研究者遥相呼应。

另有一仅限于流动儿童这一群体进行的研究，认为经济资本、家庭外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等对流动儿童的整体自尊、成就自尊、社会自尊分别具有一定的影响（申继亮、胡心怡、刘霞，2007），其大抵属于正相关关系。还有人认为，学校的安全与纪律、歧视与排斥、师生关系和社会支持均显著影响流动儿童的精神健康（何雪松、巫俏冰、黄富强、肖莉娜，2008）。

以上这些研究表明，相对于城市儿童而言，流动儿童有着较为严重的心理问题。其中，民工学校流动儿童的心理状况尤其应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

三 社会适应与融合

需要说明的是，前述关于流动儿童教育问题以及心理问题的研究，并非分别意指教育学学科与心理学学科内的学术成果，而关于流动儿童社会问题的研究亦非专属社会学的研究视野，这里

只是为了分类概括的需要而做的粗略划分。实际上,对于具体研究者而言,并不存在研究领域之间的拒绝和排斥,从事教育学的研究者也可能关注心理以及社会问题,从事心理学的研究者也可能关心教育环境与社会关系,从事社会学的研究者也可能涉及教育体制与心理认知。而真正想要从总体上熟悉并理解流动儿童的社会生活现实状况,则有必要暂避门户之见,多方位多角度地认识这个群体。毕竟,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任何一类问题,都不是单一学科所能完全解释得了的。上述关于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及心理问题,不可能与社会问题无关,而这里将要概述的社会问题,也必然与教育问题及心理问题相关。总结各学科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既可做到一定程度的相互印证,也便于看清问题形成和发展的综合性机制。

站在最宽泛的角度看,流动儿童教育问题与心理问题属于社会问题的两个组成部分,上述研究已表明问题发生的严重性。然而,教育问题与心理问题并不是该社会群体所有问题的全部,他们对城市社会的适应性问题、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化问题、与城市社会的融合问题,以及留城意愿问题等,也同样重要。为便于比较,我们姑且将流动儿童的“社会问题”稍作限定,特指与日常社会生活有关、有别于教育问题和心理问题的其他问题,这里主要论及的也就是上述四个方面。

(一) 社会适应性

关于流动儿童社会适应性的研究,心理学界和社会学界都在探讨。将现有观点粗疏归类,可分为两种:一种认为流动儿童在城市社会的适应状况不容乐观(王莹,2005:32;任云霞,2008;何亚玺、肖琳,2008);一种则对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能力持乐观态度(郭良春、姚远、杨变云,2005;李柏宁、熊少严,2007;刘杨、方晓义、蔡蓉、吴杨、张耀方,2008)。

前者主要从社会排斥出发,认为流动儿童身处城市社会,面临社会福利、观念、社会关系、社区、休闲、认同等方面的排斥,这种排斥对流动儿童适应城市社会有着消极影响,因而主张政府及有关部门消除制度性障碍,建立专门机构或组织来维护流动儿童的社会权益。

后者立足于考察流动儿童在城市社会生活的各种适应能力,如价值取向、学习、生活方式、人生理想等方面的适应能力,认为流动儿童具有适应城市社会生活的能力,并在总体上已经达到较高水平。然而,尽管他们认为流动儿童大多能够逐渐适应城市生活,如“流动儿童适应状况较好”(刘杨、方晓义、蔡蓉、吴杨、张耀方,2008),“(他们)正在实现着城市身份的塑造、城市语言的掌握、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城市化转换等方面的全面性城市适应历程”(李柏宁、熊少严,2007),但是在某些方面也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与障碍。由于自卑心理以及对城市社会的拒斥,流动儿童对城市的适应只是局部适应,“社会用一堵无形的墙把他们圈在一起,隔离于城市儿童享受的保障和权利之外”,“他们说对于城市的生活‘很适应’时,其实只是在自己圈子里的‘适应’”(郭良春、姚远、杨变云,2005)。

这两种互相矛盾的观点,都具有各自的理论依据,看似不可调和,实则真正分歧在于对“社会适应”这一概念的理解及界定不同。如果将“社会适应”看做价值观、社会生活、学习生活等方面的适应(郭良春、姚远、杨变云,2005),或将其视为心理与社会文化适应(刘杨、方晓义、蔡蓉、吴杨、张耀方,2008;袁晓娇、方晓义、刘杨、李芷若,2009),则很容易从调查中发现,面对环境的变化,城市生活时间较长的流动儿童,将逐渐改变原有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从不习惯到日渐接受并达到内化。这类研究可能忽视了流动儿童主要参照上的特征,即在回答中主要参照的是刚进入城市时那种不自在、不适应状态,而只看到其现在纷纷表示已经熟悉并适应,因此认为流动儿童具有较高的社会适应能力。而将“社会适应”等同为“社会融合”或“社会整合”意义上的研究者,则很容易将关注点集中在流动儿童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种种制度性限制与社会歧视,从而得出较为悲观的研究结论。

基于对上述经验研究中存在问题的认识,蒋华、徐旭英、陈强(2007)主张从结构角度探讨流动儿童的适应问题,他们发现适应具有多层性,即表层、中层、深层,三者同时进行,但速度不一;与此相对应,适应的基本方式也需分为同化、顺

应、反同化，且不同的适应方式将产生不同的结果。关于流动儿童社会适应问题，应在界定清晰的“社会适应”概念基础上，依据复杂多变的实际情况，进行更为细致且贴近社会事实的调查与分析。

也有学者从校际差别出发，如曾守锺（2008c）发现公办学校的流动儿童在行为问题和受歧视感上要好于简易学校的流动儿童，在学习成绩、社交焦虑和友谊三方面不比简易学校的流动儿童差，从而认为公办学校比简易学校更有利于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李晓巍、邹泓、王莉（2009）发现，公立学校中流动儿童的学校适应优于打工学校，因此建议充分发挥公立学校的教育主渠道作用，增强其吸纳流动儿童入学的能力。袁晓娇、方晓义、刘杨、李芷若（2009）通过研究也发现，公立学校流动儿童在社会文化和心理适应上都明显优于打工子弟学校的儿童。史晓浩、王毅杰（2009）通过对两个在城市就读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结构与适应策略选择进行解读，发现从时间维度看待流动儿童城市社会的适应，民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的选择更倾向于指向过去，适应结果是与城市文化相分离，适应策略是返回家乡，他们在城市中的身份是“旅居者”；而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的选择更倾向于指向未来，适应结果是被城市文化同化，适应策略是定居城市，他们在城市中的身份是“准市民”。这些研究与前述赞成积极开放城市公办学校的主张不谋而合。

（二）社会化

社会化是指学习社会生活技能和行为规范，以便成为其所属社会合格成员的过程。儿童时期是社会化的关键阶段，这段经历对其一生的发展都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从农村流入城市，生活环境、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很可能影响流动儿童社会化的形塑与进展，相关的各类研究，则大多指向消极不利的一面。

赵向利（2006）将流动儿童社会化分为五个方面，即性格与行为特征、生活技能、生活目标、社会交往和自我认识。他对河南洛阳市两所公立学校流动儿童的实地调查发现，与城市儿童相比，流动儿童在性格与行为特征方面，自我认为更“不合群”；在社会交往方面，较易感到“孤独”、社交能力较低；在自我认